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七辑)

总主编/李玉明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民兵组织和大生产运动

张国祥

/ 著

民兵组织的发展壮大,与大生产运动的卓有成效的开展,是抗日根据地的两大战略支点,是人民战争谱写的壮丽篇章。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王灵善
 张建英
复 审:石凌虚
终 审: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民兵组织和大生产运动/张国祥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9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7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665-6

I.山… II.张… III.①农村革命根据地-民兵
组织-史料-山西省②农村革命根据地-大生产运动-
史料-山西省 IV.K2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026 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七辑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民兵组织和大生产运动

张国祥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125 字数:30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套

*

ISBN 7-203-04665-6

K·272 定价:30.00 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任继愈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主 任 委 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杨建峰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颌
张国祥	张根玉	张捷夫	罗广德
武丕仁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 恺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录

一、对敌斗争中的民兵组织	(1)
(一) 民兵组织的由来和发展	(2)
(二) 在对敌斗争中大显身手的民兵 ...	(4)
(三) 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范例	(14)
(四) 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新创造	(17)
二、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	(20)
(一) 大生产运动在北岳 (冀晋)	(22)
(二) 大生产运动在晋绥	(25)
(三) 大生产运动在太行	(28)
(四) 大生产运动在太岳	(29)
(五) 部队和机关的大生产运动	(32)
三、妇女纺织运动	(36)
(一) 妇女纺织运动的发展概况	(36)
(二) 妇女纺织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 ...	(42)

引 子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最广泛、最深刻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而民兵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其对敌斗争的胜利进行，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卓有成效的蓬勃开展，正是农民群众抗战和生产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的具体体现。在这方面，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同样是走在前边的。

一、对敌斗争中的民兵组织

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实行着“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即主力军、地方军（游击队）和民兵。主力军的任务是，打击敌人的主力部队，保卫抗日根据地；地方游击队的任务是，在县境和分区范围开展游击，机动灵活，随时打击敌人；民兵的任务是，就地坚持活动，保卫家园，保卫村庄，保卫群众。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尽管任务有别，但对敌斗争目标一致，他们三位一体，协同作战，互相依存，彼此配合，是缺一不可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坚持

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从根本上说，就是依靠这样一支在体制和组织上健全的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的。由此可见，民兵的地位是重要的，作用是很大的。由于山西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实行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是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模范区，所以，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谱写出了更加光辉壮丽的篇章。

（一）民兵组织的由来和发展

民兵是在人民抗日自卫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民兵组织就成为抗日自卫队的升级和发展。抗日自卫队不分阶级、民族、信仰、性别，年龄在16岁至55岁的抗日民众，均可自愿报名参加，成为抗日自卫队队员。在不少地方，抗日自卫队都是在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在这些地方就把它当作群众抗日团体来看待。1940年之前，在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根据地的抗日自卫队组织，一般建制到县（也有专区和边区的），县设总队、区设大队、行政村设中队、自然村设小队。总队和大队领导人，由上级指派；中队和小队领导人，则由队员民主推举。抗日自卫队组织一成立，广大队员们即拿起土枪、土炮、大刀、梭镖，以至木棒等粗劣武器，担当起了各种战时勤务的工作，或者站岗放哨、清查户口、捕捉敌探奸细，维持社会治安；或者负责通讯联络、运送军实、充任向导、救护伤员，协助我抗日部队打仗。当然，也有许多抗日自卫队直接参加战斗，配合部队作战的。但无论在执行战时勤务中，还是在配合部队作战

中，各根据地的抗日自卫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敌我之间斗争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敌人把主要力量回师敌后，重点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后，尤其是1940年至1943年这个期间，敌我双方围绕着“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展开了异常激烈、极其残酷的搏战。由是，敌我双方斗争的特点发生了新的变化：由原来那种长距离的进出，大块土地的争夺，发展到为着一个小村庄、一条小河沟、一架小山梁的寸尺土地之争；对垒的方式，亦从当初的摆开阵势，你来我往，演进为纠缠一起、拳打脚踢、互相厮杀的态势。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新的形势，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就不可能固定在一地，与敌展开对战，而必须灵活转移，东奔西波，寻找有利战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或致命打击。于是，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村庄、保卫群众的切身利益，而随时随地同来犯之敌展开周旋，袭扰敌人、疲惫敌人、打击敌人的战斗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群众自己的武装组织身上。对敌斗争形势的迫切要求，使人民武装就不得不实行自身的改革和完善，即将抗日自卫队中的青年、壮年人升化发展成民兵，担负起对敌作战的历史任务，而继续留在自卫队的人们，仍然去执行一般的战时勤务。

人民武装的自身的改革和完善，民兵组织的壮大和发展，是在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是在蓬勃开展的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实现的。1943年，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民兵即扩大到10万之众。1944

年，全区民兵更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十几万人的强大力量。1942年初，晋绥边区民兵猛增至2.5万人，相当于1941年前半年民兵总数的7倍。到1942年底，全边区人民武装扩大到19万人，其中抗日自卫队发展至16万人，民兵上升至3万余人。经过1943年春季的反“蚕食”斗争，全边区民兵又发展成为拥有5万余人的大队伍。进入1944年后，全边区民兵更扩大至8万人。到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民兵已增至41600余人。秋季大备战的显著成效，十月“黄崖洞保卫战”的光辉胜利，使民兵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扩大。至年底，全区民兵发展到56560余人。随着1943年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实施，和1944年结合生产对民兵政治、军事训练的加强，进一步提高和发展了民兵组织，这时，全区民兵即扩大到9万余人。在太岳区，至1944年民兵扩大到5万人，成为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1945年，太岳区继续大力发展民兵、发展抗日自卫队。要求：到年底，发展有战斗力的民兵10万人，做到全区民兵占总人口的8%，个别地区达到10%。

（二）在对敌斗争中大显身手的民兵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的1938年5月，毛泽东又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进一步揭示道：“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

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的这些当初的预见，在短短两三年以后的时间里，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而这种活的现实的集中体现者，就是中国解放区战场上的民兵；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当是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民兵土生土长，是农民中的最精干分子，是最具有广泛性的群众抗日武装组织。他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坚持劳力和武力相结合，平时劳动，战时打仗，既是生产的能手，又是战斗的尖兵，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尽管在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有敌人的疯狂“扫荡”、“食蚕”、“封锁”，有伪军的肆意进攻，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大搞磨擦，我抗日根据地处在敌、伪、顽的夹击之中。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发动群众，组织了民兵，构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机动灵活的强大战斗体系，就陷敌于全民皆兵的火阵里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在最为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一般都是以地方抗日游击部队就地分散开来，与广大民兵密切结合，一方面帮助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安全转移，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一方面，则与敌展开扭打，用地雷、石雷、手榴弹一类的武器，巧妙地杀伤敌人。主力部队即转进敌人后方，破击敌人的交通、据点，造成敌人的惊恐与混乱；尔后，再灵活集结重兵，一股一股地歼灭敌人。敌人出发了，首先

迎击敌人的就是民兵。他们以高度的分散，3人一群，5人一伙，漫山遍野，随时随地杀伤敌人，好像麻雀吃谷子一样，见机行动，乘隙而入；有利时，就主动出击，狠狠袭敌；不利时，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遇到小股之敌，民兵就集中起来，一举而歼灭之；适逢大队敌人，民兵就化整为零，四处袭扰。敌人进入村庄，民兵就即行扰乱，使其不得安宁；待敌人回击时，民兵就爬上了山头；当敌人向山头扑来，民兵又乘机以杀伤；等敌人爬上山头，民兵即复转回村里，干掉其留守部队。如此左右辗转，好像推磨一样地不停周旋，迫使敌人不得不撤退。而在敌人要逃窜的时候，邻村联防的民兵，一声呐喊，便纷纷出动，对敌人形成阻击、截击和围剿之势。北岳区、晋绥边区、太行区和太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一次又一次反“扫荡”作战，就是这样由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以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赢得胜利的。正如刘伯承在回味这一段饶有兴趣的历史时，深有感触地追述道：“在反‘扫荡’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我根据地后，立即遭到沉重的打击。敌人出发了，我们遍布各地的情报站、瞭望哨就以各种方法传递消息，使广大军民随时都知道敌人的动向。敌人所到之处，不仅遇到彻底的空室清野，并且到处触发地雷，遭受袭击。部队和民兵，时而分散，时而集合，用各种武器袭击敌人，

而敌人却到处找不到他们。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

在反“扫荡”斗争中，民兵配合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作战；在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中，民兵同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配合作战中，打了许多漂亮的仗，进行了许多好的“围困战”。1942年夏季，在太行区的反“扫荡”作战中，由辽县第七区之车上铺、沐池、东寺圪、柏官寺、东叫沟等村的民兵，配合我主力一部，于5月30日，设伏于辽县城至黄漳公路线上的苏亭一带，以我仅伤亡两个人的代价，给敌以重大杀伤，计毙日伪军140余人、骡马80余匹，还缴获了一部分军用物资。1943年秋季，在北岳区的反“扫荡”作战中，行唐以北之苇园、联庄两处敌军，企图“合击”我刘家庄。我刘家庄、马化等7个村的民兵游击小组获息后，奋起阻击由苇园来犯之敌。从清晨到黄昏，他们在连续20多里的山头上，以土枪、手榴弹和地雷等武器，与500多敌人周旋了1天，致使敌人无法前进，给我主力部队赢得了有利战机，迅速击溃从联庄出犯的300多敌人，完全粉碎了敌人“合击”的计划。说到“围困战”，太岳区的“沁源围困战”，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随着民兵队伍组织的日益壮大，抗日积极性和战斗力的不断提高，他们除密切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作战外，

还能够独当一面，单独进行对敌作战。或者破击敌人交通，或者偷袭敌人据点，或者伏击出犯之敌，或者围困驻剿日军，或者捕捉特务、汉奸，或者摧毁“维持会”和伪组织。特别是保卫春耕、保卫夏收和秋收的战斗，在许多地方，都是由民兵自己来进行的。1943年夏季，晋绥边区宁武县民兵在保卫麦收的斗争中，取得了突出的战绩。在7、8两月中，敌出扰54次，和民兵作战138次，其中民兵主动出击100多次，毙伤敌伪军20多人，捕捉汉奸10人，从敌人手中夺回的被掠物资，占有所有被掠物资的50%以上。整个夏季，除了5亩多麦田被敌毁坏外，全县庄稼未受任何损失。在单独同敌作战中，民兵还能够适时出援，解救我处在危难中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1943年2月，进犯晋绥边区交城之敌百余人，于某日拂晓，突然包围了我主力某部的哨班驻所。尽管该部奋起抵抗，但终因众寡悬殊，不得突围。在危急中，附近村庄的民兵迅速赶赴战地，侧击敌人，使其受创，即行逃窜，全班战士得以解围。同年5月，在北岳区阳会崖战斗中，我主力某部一个连队陷敌重围。平山、灵寿一带的民兵得息后，即起策应，四面袭敌。在民兵的打击下，敌惊恐逃窜，我被围部队得以解救。

在对敌作战中，广大民兵英勇顽强、机智灵敏，表现了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极大的创造性。晋绥边区静乐县狮子崖的3个民兵，为打击来犯的60余名敌人，便隐蔽在狮子崖的山头上，从3个不同的方向对敌人开了枪。3颗子弹，当下就结果了3个日军。其余日军即乱作一团，慌忙向山头上射击。我3勇士，则安然地伏在石缝里瞄准

敌人，给予还击。敌人遂分兵 3 路，向山头猛扑上来。我 3 勇士，又利用乱石，把敌人一个一个地打翻下去。临近中午，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向敌人甩手弹弹，手榴弹打完了，又用石头砸敌人。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把敌人搞得疲惫不堪。无奈之下，敌人只得抛下尸体和抢来的东西，拖着伤兵退回到据点里。而我们的 3 勇士，则连续激战 8 小时，以毙伤日伪军 20 余人的战绩，胜利归来。一天夜间，北岳区某抗日支队的两个小队，掩护民兵到平汉铁路附近的沟外去，路经一村庄时，突然遭到 140 余敌伪军的伏击。危急中，为掩护主力和民兵们转移，由小队长带着两个党员民兵，奋勇冲入敌阵，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战，先是拼刺刀，接着又是甩手榴弹。整整拚杀了半夜时间，毙伤敌伪军 20 多人。3 位英勇的民兵战士，虽也伤痕遍体，但仍顽强地突出重围，胜利地回到了我们的根据地。刘二堂，是太行区辽县（今左权）大洋角村的民兵神枪手，敌人每次“扫荡”，都要被刘二堂打死人马甚至指挥官。因此，敌人对刘二堂切齿痛恨，1942 年 5 月大“扫荡”时，专以 1000 余人的兵力捕捉刘二堂。刘二堂的弟弟见义勇为，假称哥哥刘二堂，不幸被敌人残杀。当时，辽县各地民兵尚不知真相，争相为刘二堂报仇，且自称刘二堂者，亦不乏其人。一时，到处都是刘二堂和刘二堂的民兵，闹得敌人晕头转向，惶恐不安，不得不惊呼：为什么杀了一个“刘二堂”，反而会出现这样多的“刘二堂”？在太行和太岳山区，民兵们运用地道战的经验，带领群众，钻到山沟沟里开劈出许多地道式的窑洞来。这些窑洞，洞洞相通，山山相连，一

连就是好几架山，几十个洞。和平原的地道相比，在山区窑洞面前，敌人却束手无策。所以，老乡们管它叫做“窑洞保卫战”。像这样的“窑洞保卫战”，在太行区的武乡县开展得尤为突出。全县凿有窑洞 7500 多孔，同敌人进行了 570 余次战斗，创造了许多“窑洞保卫战”的模范战例。其中，漆树坡“窑洞保卫战”，以 7 个民兵、5 条枪，抗击了数百名的“围剿”之敌，并且取得了打死敌伪军 50 多人的战绩，由此扬名于整个太行区。壶关县常行村，是进行“窑洞保卫战”的又一个典型。曾有 18 个民兵，以窑洞为依托阻击千余日伪军向我太南根据地“扫荡”，连续激战 4 昼夜，毙敌伪军 60 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村庄、保卫了群众。在晋绥边区的汾河两岸，民兵们设下迷惑敌人的圈套，男民兵扮作贩卖汽油的商人，女民兵装作运油的脚户，巧妙地充当了敌人运输弹药和汽油的“帮工”。他们利用装船的机会，用锥子刺破油桶。当敌人还在为这一个个“顺民”的自动“帮忙”而兴致时，汽油已悄悄地溢满了船舱，船上突然起了烈火，使弹药全部爆炸。一时间，爆炸声、喊声、风声、水声汇成一片惊人的“交响乐”。这就是为人们广泛流传的所谓“火烧弹船”的故事。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各抗日根据地民兵，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创造了一整套适合自己特点的作战形式，除上面提到的伏击战、围困战、窑洞保卫战外，还有麻雀战、破击战、捕捉战、袭扰战、推磨战、联防战、混水摸鱼战、鬼子喝水战、鬼子洗澡战、坚壁清野战、三位一体战、地雷战、石雷战，等等。尤其是地雷战和石雷战，

曾造成极为广泛的群众性的爆炸运动，以至出现了“家家打石雷，人人学埋雷”的热烈情景。在爆炸运动中，太岳区的民兵就创造了铺地运动、清扫街道、摆死狗阵、草人爆炸、毁井断源、乘机劫敌、号炮动员、狼烟熏火、怪声扰敌、陷阱制敌等 10 大战法。到 1944 年，把打造石雷的群众运动推向高峰，1 年间，全区民兵打造石雷达 10 万余颗。在群众性的爆炸运动中，各抗日根据地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爆炸能手、爆炸英雄。在太岳区沁源 1 县，民兵爆炸能手就有 300 多人。太行区民兵英雄、武乡县李家峪“地雷大王”王来法，以潘（龙）武（乡）公路为战场，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带领民兵拼杀在这条交通线上，运用多种方法，巧妙布下各式各样的“地雷阵”，“迎接”着日伪军的“到来”。从 1941 年到 1943 年，就炸死日伪军 123 人，俘虏日伪军 40 多人。广大民兵，不仅在地下布有“地雷阵”，而且在天上还摆有“天雷阵”。1943 年，在北岳区的秋季反“扫荡”作战中，五台一带的民兵，即用地雷布成一种“天雷阵”，来对付“扫荡”的敌伪军。他们预先侦察到，有 200 多敌伪军，押着 500 多头牲口，往返于孟（县）平（山）之长（峪）五（台）大道上，赶运各种物资，便决计给敌以沉重打击：首先选择好地形，确定设伏在路的两旁足有 10 多丈高的黑石崖底；尔后即将量过长短的绳子拴在地雷的引火线上；等到敌人过来时，从山崖上把地雷吊下来，不高不低，正好吊到敌人的脑袋和胸部之间。一阵阵“轰隆”声过去，30 多个日伪军的性命给结果了，还丢下了一大批物资。真是“下有地雷阵，上有天雷阵”——

我英雄的民兵，就是用这样的“厚礼”来“欢迎”敌人的“光临”。为此，他们以高亢的怒吼，正告敌人：“来不让来，走不让走，看你日本鬼子，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吧！”

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组织是坚固的，阵营是强大的，对敌作战是频繁的，取得的战绩是辉煌的。据初步统计，在北岳区：1941年夏季反“扫荡”作战中，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共作战501次，毙伤俘敌伪军4700多名，破坏铁路、公路干线590多里，炸毁火车3列、桥梁2座。1942年9月至12月，全区民兵在一连串的大规模的破击战中，摧毁敌碉堡154座，炸毁汽车23辆、装甲车2辆、火车8节、桥梁46座，破路380里，平封锁沟563里。1943年冬季，在粉碎敌人大“扫荡”的作战中，主力部队共作战2083次，民兵作战2192次，爆炸地雷4840多颗，总计毙日伪军1万余人。1944年1月至9月，全区民兵单独作战4570次，爆炸986次，参战民兵89960人，毙敌伪军937人，伤敌伪军1617人，俘敌伪军904人；配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作战840次，爆炸156次，参战民兵37382人，毙敌伪军353人，伤敌伪军406人，俘敌伪军446人。总计，毙伤俘敌伪军达4660余人。在太岳区：1941年1月至7月，全区民兵和地方武装作战88次，毙伤日伪军331人，俘伪军89人，缴获步马枪37支、轻重机枪各1挺，破路30里。同年秋季反“扫荡”作战中，全区民兵作战312次，参战民兵4890余人，毙伤日伪军94人，捕捉汉奸31人，解救民夫617人，摧毁“维持会”、伪

村公所 30 个，炸毁桥梁 14 座，破坏道路 220 里，炸翻火车 1 列，缴获长短枪 38 支、子弹 2100 发、牲口 120 头，收割电线 350 斤，砍电杆 290 根。1942 年，全区部队作战 2767 次，民兵作战 1700 余次，总计毙伤日伪军 4769 人，俘日伪军 1467 人。1943 年和 1944 年，全区民兵作战 4890 次，毙伤日伪军 3206 人。在抗战第 8 年中，全区民兵和抗日自卫队，单独作战 3650 次，配合部队作战 1507 次，参战人数 56234 人，总计毙伤日伪军 3185 人，俘日伪军 432 人，捕捉汉奸、敌探 375 人，争取日伪军反正 289 人，缴获轻重机枪 12 挺、步马枪 342 支、子弹 16980 发、手榴弹 132 颗、牲口 686 头、羊 2336 只、粮食 408500 余斤、食盐 6990 余斤、电线 93120 余斤、铁轨 57500 斤，摧毁汽车 2 辆、火车头 2 个、车厢 9 节，破坏公路 87 里、铁路 48 里，解救民夫 11656 人。在晋绥边区：1942 年 1 年，全边区民兵作战 672 次，毙伤日伪军 1000 余人，捕捉汉奸及敌伪人员 220 名。自 1940 年到 1945 年 6 月，全边区民兵共作战 19149 次，毙伤俘日伪军 12026 人，缴获各种枪支 797 支（挺）、各种子弹 243949 发、骡马 193 头，摧毁敌汽车 30 辆、碉堡 20 座、桥梁 50 座，破坏公路 5450 余里，收回电线 224336 斤、铁轨 220092 斤，夺取被敌抢去的粮食 1593604 斤、牲口 6863 头、猪羊 18581 头。在太行区：1943 年 5 月反“扫荡”作战中，全区民兵作战 2255 次，参战民兵 15000 人，毙伤俘日伪军 1928 人，捕捉汉奸、特务 445 人，解救民夫 711 人，缴获长短枪 47 支、机枪 2 挺。从 1940 年到抗战胜利，全区民兵共作战 3 万多次，毙伤日伪军 8334 人，